



# 社会特刊

SHEHUI TEKAN 2023年2月9日 星期四



## 丹凤4支招商小分队授旗“出征”

本报讯（通讯员 陈波）近日，丹凤县召开2023年招商小分队外出动员会，对4支招商小分队授旗并下达出征令，本着“起步即冲刺、开局即决战”的姿态奔赴全国各地，全面踏上“项目建设提升年”新征程。

县上规定，4支招商小分队全年在外招商引资不少于100天，招引链主企业1家、高品质酒店1个、总部经济企业两户以上，引进亿元以上项目不少于15个。县上预算每支

招商小分队每年工作经费10万元，用于工作开展期间办公、会议、差旅、交通等日常费用保障。同时，建立招商小分队实绩档案，将招商小分队工作实绩纳入全县招商引资工作考评范畴，按照《丹凤县招商引资考核奖励办法》进行考核奖惩、优胜劣汰，对工作表现好、超额完成招商任务的招商小分队予以表彰奖励，对敷衍了事、工作无进展无特色的干部及时召回更换。

# 一身肝胆写春秋

郭明霞

## 出彩商洛人

杜景，原名杜尚毅，1914年2月出生于商县（今商州区）腰市镇杜村一户农家。他有一个哥哥、两个弟弟、一位小妹，父亲勤劳且有经商头脑，因此家境殷实。

杜景是商洛山区革命斗争的亲历者、参与者和见证者。1937年6月，他在西安上中学时就参加了革命，曾在内蒙古和陕北从事革命工作，1946年奉命回商洛艰苦战斗。

1949年7月12日，商县解放后，杜景担任商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公安局局长。1952年后，杜景曾任丹凤县县长、县委书记，商洛地委常委、候补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等职。

1964年，杜景调往西安，任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陕西分公司党委书记、经理，1983年离休。离休时，陕西省委组织部为杜景下文（陕组干任字〔560〕号），享受正厅级待遇、红军待遇。

杜景的儿童时代，是在本村简陋的私塾里开智启蒙的。1932年，他考入腰市双戏楼商县北区分立第一高级小学校，1934年9月至1937年5月，在西安国立中学读书。读书期间，杜景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“民先队”。

西安国立中学是易俗社社长孙仁玉于1922年创办的私立学校，孙仁玉先生任董事兼教员，当时是西北颇有名气的“红色学校”。学校教员中有中共地下党员，经常在课堂上宣传民主自由思想、教唱抗日救亡歌曲，图书馆里也有不少宣传共产党革命主张的刊物、书籍，如《向导》《中国青年》等。

杜景就是在这个开明、进步、生机勃勃的校园里开阔了视野，懂得了民主革命的道理，树立了为穷苦人谋幸福的革命理想，他也常



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杜景带病巡查（左一）与副团长杜景（中一）一起下地指导农业生产。

常给家乡的同学、朋友邮寄进步书刊。

那时候，腰市川家境较好，思想开明的庄户人家，大都把孩子送到西安上中学。据江平在一篇文章中回忆，当时在西安上学的20多位知识青年，两三年间都先后奔赴陕甘宁边区。

黄川村的王嘉谟，就是从西安中山中学考上北京的大学的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他和几个同学改扮成商人，从北京流亡到山东参加抗日活动，历尽艰险。1938年春节期间，王嘉谟辗转回家，因父病重未能和杜景一起奔赴延安。

1938年农历正月十八，杜景带着王嘉谟的族弟王嘉浩、学友王金城和腰市川的另外三四个青年学生，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办手续。他们被分别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泾阳县安吴青训班，杜景当时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学习。

他们在武关结识了从国民党一所军官学校毕业的中尉连长田锡侯。田锡侯返乡后任武乡训练国民兵教练，他思想进步，结识共产党员周宝航、杜景、王士哲后，就聘此3人亦为该乡国民兵教练，受训者达500多人，大多初步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，为商洛的革命事业埋下了火种。

1939年2月，杜景被组织选派到延安中央组织部干训班学习，结业后被组织派到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工委的骑兵部队任组织干事。杜景经历了复杂险恶的敌我环境，多次死里逃生，随后，又相继在宁夏的盐池和陕西的延安、定边、靖边等地任特委干事。

1946年7月，李先念率部入陕，计划建立豫鄂陕边根据地。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调令，调集陕南籍干部到商洛参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，杜景乃其中之一。

1946年8月上旬，豫鄂陕边区第二地委在商县北宽坪唐渠成立中共商洛县委、商洛县民主政府。会议决定，刘丹东任县委书记，刘英才任县委副书记、县长。杜景任县委统战部部长兼板桥区委书记、区长。

短短两三个月时间，杜景便利用乡党关系，从北宽坪屈培谋的地方武装拉出了50多人40多条长短枪的游击队伍，编成一个独立大队，屈培谋任大队长，下设三个中队，为当时的商洛县委扩充了武装力量。

1947年春天，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根据中央指示撤离商洛，北渡黄河移师山西晋城休整。大队前脚刚走，胡宗南的10个正规团就闯入根据地，与豫鄂陕边的17个正规团及地方保安武装纠集一起，围剿、合击地下党、游击队，强迫群众移民并村，空室清野，杀害乡村干部、家属和自卫队员。白天，他们像过筛子一样，搜索每座山、每道沟；夜晚，在大小路口、河谷设关卡持枪盘查。

敌军所到之处，建据点、修碉堡、抢财物、烧民宅，从北宽坪到留仙坪六十里的山川，随处可见被焚烧的房屋。山坡上，大路边，一堆堆新垒的坟莹十分扎眼……

中共商洛县委、县政府驻地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中遭到破坏，地下党员和游击队都分散隐蔽。

屈培谋是腰市西坡村人，与杜景家仅隔一道小山梁，在板桥的麻湾惨遭敌人杀害，反动派把他的头颅挂在腰市街的过街楼上示众3天。屈培谋牺牲时，他的女儿屈琴娃只有3岁。

这时候，陕南游击指挥部司令员巩德芳由于长期游击作战积劳成疾，身染沉疴，先在条子沟豹子洞住了7天7夜，因无粮无药病情加重，后又隐藏在桃花许家塬中医士许善家的红薯窖里治病；副司令员薛兴军率领第9支队，掩护大部队分两批向山西转移。

为了牵制敌人，刘丹东和杜景带领一部分游击队员，与气势汹汹的国民党部队日夜周旋于深山老林。几个月的时间里，他们一直缺吃少穿，忍饥挨冻，有时一天就得换好几个地方。

1947年3月12日，薛兴军带领护送第二批主力部队北渡黄河返回丹凤后，在今丹凤县龙驹寨白家庄磨子沟与刘丹东和杜景率领的游击队会合，大家正在为完成任务而高兴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已被几倍于己的敌军四面包围。

薛兴军、刘丹东、杜景立即组织突围。他们冲在队伍的最前面，猛打猛冲，终于撕开一道口子，向敌人防范最弱也是最陡的山梁奔去，子弹从他们的头顶、左右“嗖嗖”飞过。

爬到半山腰时，突然刘丹东头部中弹，滚下山坡。此时，杜景就在离他一米多远的地方，本能地扑向刘丹东想一把拉住他，刚一抬手，一颗子弹从脚后跟穿透脚板，鲜血直流，鞋被子弹划成了两半。杜景赶紧喊：“大家不要管我，这伤要不了命，快跑！”他从衣襟上撕下一条布，把受伤脚紧紧裹住，望望刘丹东滚下去的地方，含泪咬牙继续向山顶爬去。

队伍被打散了，杜景忍着伤痛，拼尽全力爬到山顶，因速度快，呼吸急促缺氧，刚刚靠在一棵树上，就晕过去了……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当他被山下的枪声再次惊醒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与薛兴军他们也失散了。

刘丹东牺牲后人们发现，他腹部患脓疮，身无分文，仅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野麻籽，这就是他和杜景及游击队员们充饥的食粮。刘丹东牺牲时，年仅28岁。

杜景和队伍失散后，孤身一人，还跛着一只伤脚。敌人封锁了公路，在山里的小路上也设卡盘查，他白天不敢走，只能昼伏夜行，从磨子沟后面的山梁一路向西，借着朦胧的月光爬坡翻岭，朝着家乡腰市的方向艰难地前行。

杜景的儿子杜建平说：“白天因敌人搜山清剿，父亲只能在山洞躲藏，凄冷的夜晚，才提着刘庚政委送给他的左轮手枪出来寻觅食物，常常与山里的野兽不期而遇，却不能开枪。”

一天黄昏，躲在半崖上的杜景眼看着搜山的敌人三三两两撤走了，才慢慢下山，摸到一栋被烧毁的房子里搜寻能吃的东西。幸运的是，瓦盆底有几把苞谷面，水缸里还有一些水，可惜铁锅被反动派砸烂了，他捡起较大的一块铁片，用两个石头支起来，点着柴火，把苞谷面捂在手里拌上水压成团，再拍扁，放在铁片上刚刚翻了两下，心里正美滋滋地想：今晚终于吃上熟食了。突然，附近枪声响起，杜景抓起饼子边跑边吃，奔向山谷深处……那一夜，因为有这块苞谷饼，他连翻了三道山梁。

此后两天，因为找不到一点五谷，他持了一些不知名的树叶嫩芽来充饥。第三天天色微明的时候，他走到一个靠近村子的地方，放眼一望坡上地多树少，咋办？猛然发现地里一个空墓，赶紧钻了进去，躺在地上就睡着了。

太阳照满山坡的时候，他醒来了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用手下意识地一摸，发现旁边竟然有个封着口的瓷罐子，拆开麻纸一看，里面全是土蜂蜜，他端起罐子吃了个饱。可刚过一会儿，胃里就难受得没完没了。杜景安慰自己：再难受都比饿死强。

杜景参加革命工作后，十多年都没回过家，家里有70多岁的老父亲和11岁的儿子，妻子是个朴实厚道的农村妇女，一家老小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，又不敢向亲戚朋友吐露半个字。

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杜景叩响了家门。个头高挑、英俊俊朗的他，此时衣衫褴褛、面黄肌瘦，一只脚上有鞋，一只脚用破布包缠着，一瘸一拐地走进家里……为了不暴露消息，父亲反复叮嘱，任何人都不得出去乱说。

其实，杜景回家之前，已经在村子对面的山沟里藏了两天，因为他不清楚自己是否已被叛徒出卖，家门会不会埋伏着国民党的爪牙？当侦察确认安全后，他才在夜深人静之时走进村里。

杜景当时还不知道，就在他躲躲藏藏奔波在回家途中时，游击队的中队长梁升元已带领30多人叛变投敌，并参加了反共宣传和大屠杀活动。巩德芳得到消息后病情恶化，不幸离世，终年38岁。

三个月后，杜景养好了伤，恢复了体力，通过家族里的人打听到地下党的消息，又迫不及待地去找寻组织了。

腰市镇的杜村是个大村子。杜景在家疗伤三个月离开之后，风声还是慢慢地传出来了。刮到北山区土匪武装头目周寿娃耳朵里的话是：“杜景去延安啦。”

1947年秋，周寿娃派其手下匪徒20多人，到杜景家抢劫杀人。一队匪兵包围了杜村，堵住了村子的各个出口，在杜景家的大门口放了两个岗哨后，一群土匪入室抢劫。他们翻箱倒柜抢了财物后仍不满足，向杜景的父亲杜辉升逼索大烟土。

土匪把老人家捆绑起来，吊在屋梁上，点燃裂了油的竹扫帚，烧得年过七旬的老人撕心裂肺地惨叫……直到把老人烧得浑身起泡，奄奄一息，临走时土匪又向他的头顶捶了

一鞭背，致使老人当场气绝身亡。

自古忠孝不能两全。噩耗传来，杜景却无法无法入眠。他含悲忍痛继续战斗，与游击队员一起转战于丹江南北的山川河道。

1949年4月下旬，从商南到商县，随着西进战役的节节胜利，大片区域临近解放，到处都缺干部人才。商洛地委、专署在赵川创办地方干部训练班，学员70多名，分两个班，既有部队干部，也有地方干部和知识青年；实施军事化管理，每人都有枪，随时准备参加战斗。杜景兼任队长和班主任。随后几个月，这些学员成为商洛各县接管旧政府的骨干力量。

5月下旬，中共商洛地委在赵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：由郭茂生、亢思逊、杜景三位同志组成中共商县县委。

1949年7月12日，商县解放。郭茂生任中共商县县委书记，亢思逊任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主持工作（县长空缺），杜景任公安局局长。

商洛山大沟深，历来匪患不断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国民党残匪与地方土匪及恶霸反动势力相互勾结，组织叛乱，杀害区乡基层干部，企图颠覆刚刚建立的人民政府政权。

北宽坪、黑龙口、牧护关和大荆等地都有土匪流窜活动，到处抢劫行凶，惨案接二连三。作为商县人民政府的首任公安局局长，杜景带领剿匪工作队风里雨里、泥里水里，不分昼夜地明察暗访，宣传教育，搜索线索，精准打击。

他亲自从民警和公安队（注：公安队是当时公安系统的作战队伍，相当于今武警部队，公安局局长兼任公安队领导）里挑选精明干练人员，化装成收鸡蛋的小贩，深入土匪出没的石川川地区摸清匪情后，配合公安队远距离奔袭、搜山、合击，捕获祸害几个区县的匪首王崇德、王分山等匪徒。1949年下半年，经过3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，剿灭大小土匪17股。

1950年初，杜景亲自带队驻扎大荆、腰市、深挖线索，顺藤摸瓜，掌握了匪首周寿娃的逃跑路线，从商州北乡追踪到渭南、华县，于1950年6月底，在郑州将逃匿一年的周寿娃逮捕归案。在商县全境，杜景率领公安队通过集中进剿、重点清剿、联合清剿，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终于结束了商县匪患久远、为害甚烈的历史。

1952年9月，杜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共丹凤县县长。1955年初，他调商洛地委任常委、组织部部长。之后，任商洛地委候补书记兼组织部部长。

1964年，杜景调到西安工作后，一直生活在这座文化古城，“文革”中曾遭冲击。

2000年6月5日，杜景在西安不幸病逝，享年87岁。

据杜建平回忆，直到杜景去世的前几年，他每天晚上给父亲洗脚时，父亲那受过伤脚底还是一道深槽。有一次，他开玩笑说：“爸，这是你的光荣印记，几十年踩在脚下都磨不平，可你从来都不对人说。”杜景颇有感慨地说：“唉，比起刘丹东和那些牺牲的游击队员，我受的这点伤根本不值一提，这也是我多年来不愿在公开场合谈及此事的原因。”



杜景